

俞樟华 等○著

黑龙江人天出版社

清代的《史记》研究

清代的《史记》研究

俞樟华 等◎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的《史记》研究 / 俞樟华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6.4

ISBN 978 - 7 - 207 - 10708 - 4

I. ①清… II. ①俞… III. ①《史记》—研究—清代
IV. 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1995 号

责任编辑:孙国志

封面设计:张 涛 李德铖

责任校对:秋云平

清代的《史记》研究

俞樟华 等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信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4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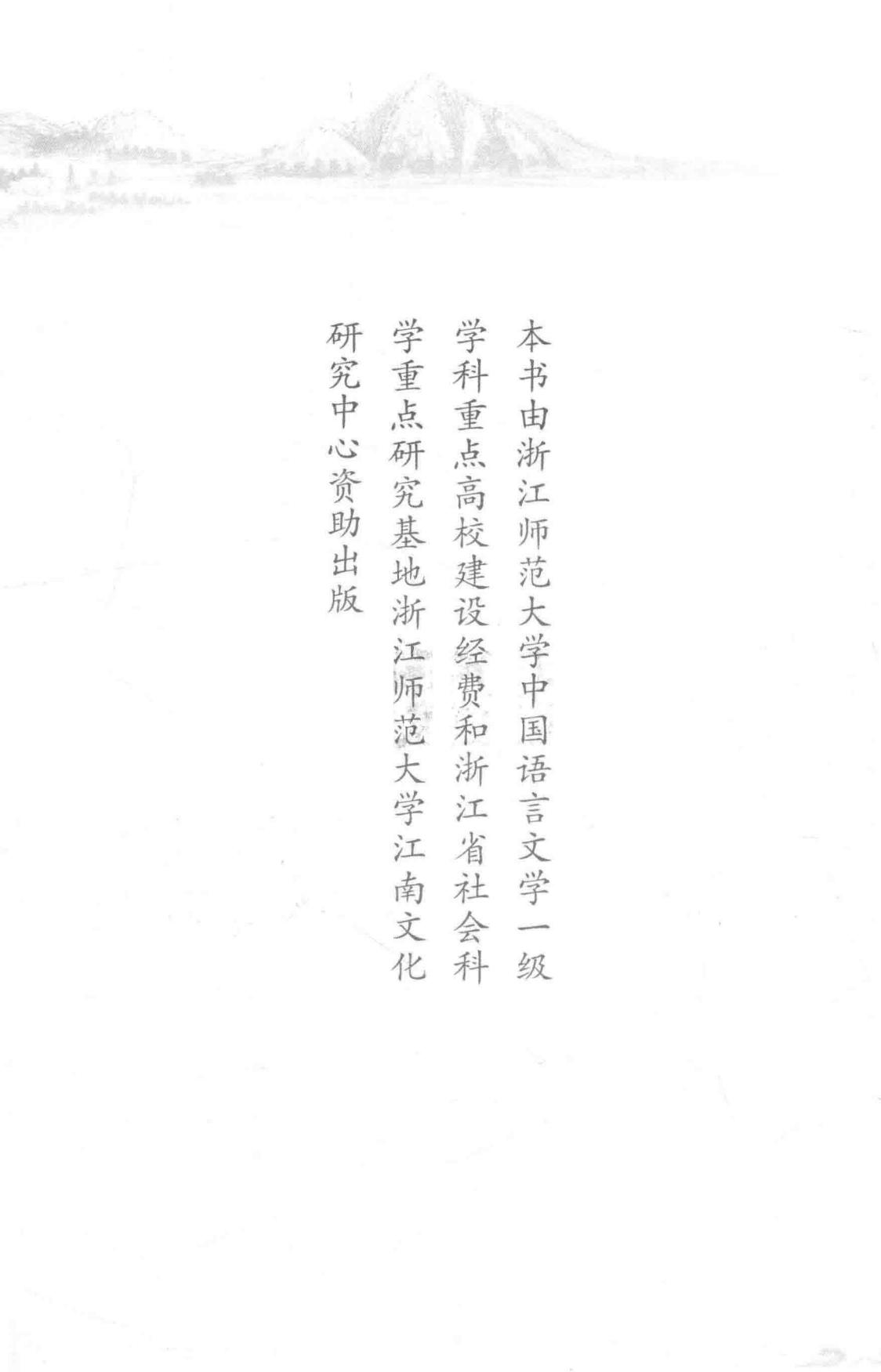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0708 - 4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51)82308054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本书由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级
学科重点高校建设经费和浙江省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
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目 录

清代《史记》研究综论	(1)
一、论乾嘉学派考证《史记》的成果	(3)
(一)考订文字	(4)
(二)考订地名、人名	(7)
(三)考订年月	(9)
(四)考订作者生平	(10)
(五)考订书名、断限、缺补	(12)
(六)考订史实	(13)
二、评清学者论太史公叙事笔法	(14)
三、论清学者对《史记》论赞的研究	(23)
四、从金批《水浒传》看古代小说评点与《史记》评点的关系	(33)
五、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从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谈起	(42)
(一)叙事“直与《史记》仿佛”	(43)
(二)叙事“有倍难于《史记》”者	(50)
六、论王又朴的《史记七篇读法》	(57)
(一)以古文说时文，以时文说古文	(58)
(二)会此意而推之，则无书不可读	(60)
(三)只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	(70)
七、曾国藩论《史记》为文之法	(72)
(一)“俱含命字之意在言外”——紧扣主旨，量身选材	(72)



清代的《史记》研究

(二)“借以自鸣其郁耳”——自鸣郁抑,情感喷涌	(74)
(三)“行气为文章第一义”——文气承接,迈远寡举	(76)
(四)“故知记事之文,宜讲剪裁之法”——详略得当,繁简相宜 ...	(77)
(五)“不可一览而尽,又不可杂乱无纪”——先后有序,布局巧妙	(79)
(六)“不妄下一字也”——用词洁准,叠词复笔	(81)
牛运震《史记评注》研究	(84)
一、《史记评注》的著者牛运震	(92)
(一)牛运震其人	(92)
(二)牛运震著述	(96)
二、评《史记》的艺术成就	(98)
(一)评《史记》的语言艺术	(99)
(二)评《史记》的写人艺术	(116)
(三)评《史记》的叙事艺术	(131)
三、评《史记》的其他内容	(150)
(一)评《史记》十表	(150)
(二)评《史记》“太史公曰”	(157)
(三)评《史记》与其他史书	(165)
程馀庆《史记集说》研究	(178)
一、评《史记》之写人艺术	(180)
(一)评人物典型	(180)
(二)评“主宾关系”	(184)
二、评《史记》之叙事艺术	(189)
(一)评文章“眼目”	(189)
(二)评“合传法”	(191)
三、评《史记》的其他内容	(193)
(一)评赞语	(193)
(二)评“十表”	(194)

桐城四祖与《史记》	(199)
一、接受的背景与动机	(202)
(一)意欲存明代之史	(202)
(二)文统的一脉相承	(204)
(三)桐城文化的影响	(206)
二、文本的阐释与超越	(211)
(一)太史公释名	(211)
(二)人物品评	(214)
(三)对《货殖列传》的接受	(218)
(四)理论的阐释与超越	(222)
三、创作的影响与局限	(228)
(一)创作的影响	(228)
(二)戴名世对《史记》的接受	(237)
(三)创作的局限	(246)
附录	(253)
论司马迁对“让国”之态度——以《史记·吴太伯世家》为例	(253)
一、吴太伯让国与季札让国之比较	(254)
(一)身份比较	(255)
(二)原因比较	(256)
(三)让国结果及让国态度比较	(258)
二、司马迁对太伯、季札让国之态度	(259)
(一)司马迁对季札其人的评价	(259)
(二)司马迁对季札“让国”持有的态度	(260)
三、让国之难	(261)
论杜甫诗歌对《史记》的借鉴与运用	(265)
论宋代诗人对韩信形象的接受	(277)
论宋代韩信诗评与韩信史评	(290)

清代的《史记》研究

俞樟华教授的学术探索与创新之路	(299)
一、《史记》研究的集成性	(299)
二、传记研究的开拓性	(303)
三、学术史研究的创新性	(305)
参考文献	(309)
后记	(318)

清代《史记》研究综论

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高峰期，其探讨《史记》者之多，考评方面之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据不完全统计，从清初到 1905 年间，研究过《史记》并有文章著作的学者，有三百人左右，论文有一百六十多篇，专著几十部，像储欣的《史记选》、吴见思的《史记论文》、王治皞的《史记榷参》、方苞的《史记注补正》、王又朴的《史记七篇读法》、汪越的《读史记十表》、汤谐的《史记半解》、杭世骏的《史记考证》、牛运震的《史记评注》、王元启的《史记三书正讹》、王鸣盛的《史记商榷》、邵泰衢的《史记疑问》、赵翼的《史记札记》、钱大昕的《史记考异》、邱逢年的《史记阐要》、邵晋涵的《史记辑评》、杨于果的《史汉笺论》、高塘的《史记钞》、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林伯桐的《史记蠡测》、王筠的《史记校》、丁晏的《史记余论》、程馀庆的《史记集说》、吴敏树的《史记别钞》、张文虎的《校勘史记札记》、郭嵩焘的《史记札记》、尚镕的《史记辨证》、潘永季的《读史记札论》、李慈铭的《史记札记》、吴汝纶的《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沈家本的《史记琐言》、杨琪光的《史汉求是》和《读史记臆说》、鹿兴世的《史记私笺》等等，都是研精覃思、启发心智的力作，其他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李晚芳的《读史管见》、刘大櫆的《论文偶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刘熙载的《艺概》、曾国藩的《求阙斋读书录》、林纾的《春觉斋论文》等著作中，也对《史记》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评论。

清人对《史记》研究的最大贡献，在考据方面。在清代，凡治《史记》者，无论史学家还是文学家，皆不废考证。他们对《史记》文字的衍、讹、脱、增、误、异、通、改、混、补，对史事的错谬、疏漏、矛盾，对舆地之古今异名和职官之沿革变化，以及年月之不伦失实、三家注之错妄疑缺等等，均详加稽考，匡谬正疵，探本溯源，其用力之勤，收效之大，可谓前无古人，后人也罕有其匹者。清人为何考证《史记》如此轰轰烈烈并硕果累累，究其原因，约有两端：



第一,清代统治者实行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知识分子动辄得咎,为全身免祸,遂逃避现实,埋头于考证古籍,故乾嘉时代,考据学风靡学界,一时史学大家,都以考据治史学,甚至认为史家如不以考据治历史,即是足齿诸史学之林。在这样的政治形势和学术风气影响下,治《史记》者以考证为主,这是很自然的事。

第二,和清人治史的指导思想有关。清人治史,最讲究实事求是,凡古史“无稽者不信,不信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余廷灿《戴东原先生事略》)。他们反对驰骋议论,反对书法褒贬,主张史家应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以期不失史实真相。如钱大昕说:“史家以不虚美不隐恶为良,美恶不掩,各从其实。”(《史记志疑序》)“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所说,更具体而有代表性,他说:“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其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迁遇,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考,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耶?”钱大昕、王鸣盛其理论如此,实践也如此,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为古史订伪文,正误谬,补阙遗,祛疑指瑕,拾遗规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治史理论和实践,对乾嘉以后考证风气的盛行颇具影响,治《史记》者也都从考证入手,从乾嘉至清末,几无例外。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清人治《史记》虽以考证为主,但也不废评论,像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考据学大家,也是考中有评,兼及史事、兼论人物的,只是非其重心所在而已。还有一些学者,如何焯、方苞、王又朴、吴见思、汤谐、李晚芳、邵晋涵、邱逢年、林伯桐、丁晏、程徐庆、章学诚、曾国藩等人,则都重在分析评论《史记》,而考证是次要的。所以除考证外,清人在《史记》评论方面的成就也足称道,不可忽视,尤其是桐城派等对《史记》艺术美的研究,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一大流派,作为封建正统文学,它雄霸清文坛 200 余

年。这个流派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从其先驱戴名世，到桐城三祖的方苞、刘大櫆、姚鼐，再到中兴之主曾国藩，直至末代宗师吴汝纶、殿军林纾，以及他们数以千计的门生弟子都十分喜爱《史记》，推崇《史记》。他们以方苞创立的义法说论《史记》，认为《史记》是义法最精的古文典范，是散文家师法学习的榜样，所以桐城派诸家，都很注重学习《史记》。为了学习有章可循，首先应该知道《史记》文章的动人美妙之处在哪里，因此，桐城派中的一些名家除了通过论文或专著对《史记》文章之美作了细微委曲的分析研究外，还通过编纂如《古文约选》（方苞）、《古文辞类纂》（姚鼐）、《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等古文通俗读本，来选录《史记》文章，并加上评点，供人阅读和学习。所以说，桐城派在深入研究和普及宣传《史记》上，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但是考据亦好，评点亦好，都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前者为考证而考证、有不当考者而考、不当辨者而辨、不当疑者而疑、不当非者而非的缺点，而且其考证也每每失之细碎，过于繁琐，其中劳而无益之处，也时时可见；后者以义法论文，局限太大，不能使《史记》文章种种美妙动人之处得到尽情阐发，个中流弊，固不待言。所以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对两者都不满意，予以批评。他说：“至于辞章家舒其文采，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力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所不当。”（《文史通义·申郑》）这里的“辞章家”，即指桐城派，“记诵家”指考据派。章氏认为他们只是溺于考索，尚空言，炫文采，而不懂得史以明义的道理，所得不多，所以他非常感叹。钱大昕也指摘方苞之病，批评说：“盖方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昔刘原父讥欧阳公不读书，原父博闻诚胜于欧阳，其言未免太过。若方氏乃真不读书之甚者。”（《潜研堂文集·与友人书》）钱氏对方苞的批评，未尝没有道理，但谓方苞不读书，并讥其得为“古文之糟粕”，亦未为准评。清人研究《史记》有不当之处，这是正常现象，不足为怪，指出其存在的问题是必要的，但过分苛求责难，甚至一笔抹杀，这就失之过激，不足取了。

一、论乾嘉学派考证《史记》的成果

近代林纾曾指出，清代治《史记》者，“厥有二派，甲派如钱竹汀之《考异》、梁玉绳之《志疑》、王怀祖之《杂志》，均精核多所发明，而梁氏成书至三十六



清代的《史记》研究

卷,论黄帝一事凡千言,其下历举异同,良足以刊《史记》之误。乙派则归震川、方望溪及先生(按指吴汝纶)之读本,专论文章气脉,无尚考据。二者均有益于学子,然而发神枢鬼藏之秘,治从冗秃肖之病,导后进以轨辙,则文章家较考据为益滋多。顾不有考据,则瞀于误书;不讲文章,则昧于古法。”^①在清代,考据学家考订《史记》,匡谬正疵,探本溯源,使《史记》更臻完善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错误较少的本子;文章家评点《史记》,抉幽发微,指说《史记》文章的妙处,对帮助读者阅读欣赏、师法学习都很有用。考订和评点,两者相互并存,相得益彰,皆有功于史学,有利于后人。作为古文家,林纾更推崇评点家,这情有可原,其实成就最大的,还得数考据家。

《史记》在长期流传、抄写、刻印的过程中,造成了很多错误。对其错误的考订,前人早已有之,如三家注对《史记》文字和史事的考释,宋人吕祖谦对《史记》亡篇缺篇的考证等都是。但是对《史记》的错讹舛误展开全面细致的考证工作,是从清代开始的,其主力军是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治《史记》,精力主要集中在对《史记》错误的考订辨析上,他们充分利用经学、小学、天文、历法、舆地、音韵、金石、版本、氏族、避讳等方面的知识来治《史记》,所发现的问题多,所解决的问题也多,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大。

乾嘉学派考证《史记》,重事实,重证据,凡创立新说,必凭证据,绝不无证虚测,妄下断语,孤证不足定其说,则罗列多项证据以定是非。在具体做法上,或以《史记》纪传对勘,或以前后文互比,或用先秦经传相印证,或以《汉书》证《史记》,在比较中明异同,见正误,分是非。乾嘉学派考证《史记》的方面很广,大至重大历史事件,小至一字一句、一地一名,都不放过,细细碎碎,既富且杂,约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考订文字

《史记》在文字上出现的问题最多,各本之间,字句有多有少,有同有异,差别很大。其错脱讹衍、增改窜乱的情况也很严重,有的地方已经使人真假莫辨,不知所从。有时一字一句的不同,含义就完全两样,史实有了出入,这势必影响到对司马迁和《史记》思想的正确评价。为了澄本清源,归复旧观,清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厘正《史记》文字上的错误。厘正文字,实为清人考证

^① [清]林纾:《畏庐续集·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9页。

《史记》的重心所在,在这方面贡献较大的,是钱大昕、王念孙、梁玉绳、李慈铭、张文虎等人。他们考证《史记》文字,主要是指正其文字的衍、羨、脱、误、增、改、缺、疑、异、诞、倒,及错简等,如:

衍文《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破赵,杀将扈辄于武遂城。”钱大昕说:“《赵世家》作‘武城’。武遂在燕、赵之交,秦兵未得至其地,恐因上文有‘武遂方城’之文,误衍‘遂’字耳。”^①这是因上文而衍的例子。又《越王勾践世家》:“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王念孙说:“‘怨伐’二字,义不相属,诸书亦无以‘怨伐’连文者,‘伐’字盖因下文而误衍也。”^②因下文而衍,这又是一种情况。《史记》衍文很多,或因上文而衍,或因下文而衍,少则一二字,多则十几字,且有错中有衍,比较复杂,要一一厘正,不是件容易的事,清人于此下了不少苦工。

讹文《十二诸侯年表》:“卫君起元年,石傅逐起出。”钱大昕说:“《左传》作‘石圃’,‘圃’‘傅’相近,‘传’盖‘傅’之讹。”^③又《齐悼惠王世家》:“孝文帝尽封齐悼惠王子罢军等七人,皆为列传。”但据《汉书·王子侯表》载,当时同封者共十人,故钱大昕认为:“此云‘七人’,盖‘十人’之讹。”^④可见“七”“十”是形近而误。像“比”讹为“北”,“徒”讹为“徙”,“劫”讹为“部”,“奏”讹为“奉”,“劲”讹为“到”等,也都属于形近而误,王念孙在《史记杂志》中均有发明。对《史记》讹文的辨正,梁玉绳《史记志疑》曾做了大量工作。

增改《史记》文字被后人或增或改的现象也很严重,如钱大昕说,《武帝本纪》“与王不相中得”的“得”字,是“后人妄增”,而“中”本可训“得”;《齐太公世家》“阙止有宠焉”,在《田齐世家》中,“阙止”作“监止”,钱氏认为这才是太史公的本文,“此篇作‘阙’,乃后人妄改。”^⑤又如《屈原列传》“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谓兮”四句,王引之说,此四句“乃后人援《楚辞》增入,非《史记》原文也。‘曾吟恒悲’四句,即‘曾伤爰哀’四句之异文。特《史记》在‘道远忽兮’之下,《楚辞》在‘余何畏惧兮’之下耳。后人据《楚辞》增入,而不知已见于上文也。”^⑥王氏的分析有根有据,是可以同意的。梁玉绳也

^①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卷五,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②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卷三之三,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3页。

^③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卷二,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④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卷四,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⑤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卷四,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⑥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卷三之五,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6页。

清代的《史记》研究

指出,《项羽本纪》“大司马咎长史翳、塞王欣皆自刭汜水上”句中,“《高纪》及《汉书》纪、传皆无‘翳塞王’三字,此后人妄增之。”^①又说《周本纪》“二月甲子昧爽”句中的“二月”,“当依徐广注作‘正月’为是。《齐世家》作‘正月’,此乃后人传写妄改也。”^②这些指正也是对的。后人传写《史记》,或不明文义,或不解古音,或据他本,或凭己意而任意增改《史记》文字的事,也屡见不鲜,它给《史记》文字造成的混乱,也是很严重的。

脱缺《史记》中的脱文缺字,以十表为最多,有的一表之中多达几十处。如王念孙指出,《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中“东野侯刘章,‘侯’上脱‘戴’字;繁安侯刘忠,‘侯’上脱‘夷’字;郿侯刘延年,‘侯’上脱‘安’字;春陵侯刘买,‘侯’上脱‘节’字;瓶侯刘成,‘侯’上脱‘敬’字,皆当依《汉表》及《索隐》本补。”^③梁玉绳也说,《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绛侯栏“其三年为太尉,七为丞相,有罪国除。”“七”下缺“年”字;舞阳侯栏“中元五年侯它广非荒侯市人子,国除”,“它广”下缺“坐”字;成侯栏“元狩二年,侯朝为济南太守”,“二”当作“三”,“朝”下缺“坐”字;贯侯栏“以都尉击项羽,千六百户,功比台侯”,“羽”下缺“侯”字;壮平侯栏“其四为丞相,五岁罢”。“四”下缺“年”字,“五”上缺“十”字,“孝文四年张苍为丞相,凡十五年而免也。”^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清人读书之细心,耙梳之殷勤,由此可见一斑。

《史记》文字上的错误,以上所述,还不完善,比如还有误倒、错简等等。如王念孙说,《五帝本纪》“动静之物,小大之神”,“小大”当从宋本作“大小”,写者误倒耳。《正义》先释“大”,后释“小”,则本作“大小”明矣。^⑤梁玉绳也指出,《卫将军骠骑列传》“其秋,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明年,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这段话中,“青为车骑将军”至“明年”共23字,当在下文“汉会将军李息击之,出代”句之后,这是传写误倒所致。^⑥对《史记》异文的校勘,以张文虎的成就为大。他的《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依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别为五卷,每卷摘取所校原文,其下即说明用以互校的各本异文及取舍理由。如《十二诸侯年表》鲁文公十四年栏记“宋、

①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9页。

②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页。

③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卷三之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5页。

④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23、523、526、534、556页。

⑤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三之一,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1页。

⑥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四,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91页。

齐、晋君死”，张氏以此设条，校记说：凌脱“宋”字、“死”字，北宋、中统、游、王、柯、毛脱“宋”字，而“齐”下并衍“君”字，旧刻不误，与官本合，由此可见，此条九本互校，各本的同异和作者态度都很清楚。因为张氏精于校勘，所以经他校勘的金陵书局本《史记》为以后《史记》点校本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清人在订正《史记》文字时，对三家注在注释方面的失误，也作了许多辨正。同时，对《史记》中的疑难字句，也或注音，或释义，随时做出解释，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史记》。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他们的优秀成果，许多已被以后的《史记》注释者所吸收、采纳。

在肯定清人考订《史记》文字的成就时，我们也需要指出，对清人的考订结果是不能盲目相信、全盘接受的。清代学者大都以现传古籍来校《史记》，这固然可以证明《史记》的错误，但是，又怎么知道清人所见的古籍就是司马迁当年作史所依据的本子呢？又有什么证据足以证明现传古籍就一定是正确的呢？所以不能够得到一点印证，就完全肯定司马迁错了。乾嘉考据学家持这种方法治《史记》，有得也有失。如《史记·周本纪》载：“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这是司马迁对周厉王残酷压制人民言论的揭露，诸侯也不以为然。正是司马迁不隐恶的描写，而梁玉绳却认为：“《国语》无‘其谤鲜矣’十五字，当是误证。”^①像这种论断，是无法让人心满意足的。所谓“疑所不当疑”，是清人考证《史记》的一大通病，明慧如梁玉绳，也没能避免。

（二）考订地名、人名

《史记》一书涉及的地名、人名，是非常多的，其中记载有误，或表达不明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如《绛侯周勃世家》载：“攻曲逆，最，还守敖仓，追项籍”。钱大昕认为，这里的“曲逆”当作“曲遇”，“逆”字错了。^② 梁玉绳也说：“曲遇在中牟，故下文云‘还守敖仓’。若曲逆，属中山，不相值也。”^③ 曲逆在今河北完县东南，古属中山。曲遏在今河南中牟东北。据史所载，赵、代、中山之地皆为韩信所取，而未闻周勃有从韩信征战事。故钱、梁之说可信。又如《商君列传》：“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顾炎武指出：“下文‘魏遂去

^①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0页。

^②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卷四，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③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2页。

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岂得围而便降？《秦本纪》昭王二十一，‘魏献安邑’。若已降，于五十年之后何烦再献乎？”^①这里为什么会出现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情况呢？原来是地名记载有误所致。梁玉绳指出了这一点：“‘安邑’二字乃‘固阳’之误。据表及《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秦商鞅围固阳降之，即此事也。”^②梁氏的分析是对的。

对《史记》地名的失误，可考者清人大都做了考订，对弄不太清楚的，只好存疑。如《秦本纪》：“四十四年，攻韩南郡，取之。”钱大昕指出：“南郡”，《六国表》作“南阳”，“战国之际，韩、魏皆有南阳，魏之南阳，即河内之修武。……韩之南阳，即秦、汉南阳郡也，但秦昭王三十五年已置南阳郡，而此又云攻韩取之，亦似可疑，若江陵之南郡，则楚地，非韩地也。”^③对不可解的不强为之解，疑者存疑，这是严谨不苟的治学态度。

至于对人名的考证，例子也很多。如钱大昕说，《管蔡世家》“卫使史鮒自言康叔之功德”句中的“史鮒”，据《左传》应作“祝鮀”，“两人同字子鱼，因而传讹”^④。王鸣盛则指出，《项羽本纪》“广陵人召平矫陈涉命封项梁”，《吕后本纪》“齐王相召平举兵欲围王”，《萧相国世家》“有故秦东陵侯召平种瓜城东”，这三句中的“召平”，“三人皆同姓名，非一人”也。^⑤又如《魏世家》曰：“魏王以秦救之故，欲亲秦而伐韩，以求故地。无忌谓魏王曰”云云，这里的“无忌”，王念孙认为杨倞注《荀子·强国篇》引此“无忌”作“朱忌”是对的，他分析说：“作无忌者，后人以意改之耳。《史记》他篇中或称信陵君，或称魏公子无忌，或称魏将无忌，其但称无忌者，则承上文而言，今无忌之名不见于上文，而忽云‘无忌谓魏王曰’，则文义不明，……且下文称‘信陵君无忌矫夺晋鄙兵’，而此但称‘无忌’，则是详于后而略于前，于理尤不可通。《魏策》作‘朱己谓魏王曰’，己、忌古同声，则《史记》之本作‘朱忌’甚明。”^⑥后来张文虎也赞同此说。

①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史记》卷二六，下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7页。

②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

③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卷一，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④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卷四，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⑤ [清]王鸣盛撰，陈文和、王永平、张连生、孙显军校点：《十七史商榷》卷四，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⑥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卷三之三，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6~107页。

(三) 考订年月

记载历史,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时间不确,有时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司马迁写史,对于主要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都注意交代清楚,基本真实可信。但其中记载失实之处,仍在所难免。在这方面,清人也做了相当仔细的考证辨析工作。如钱大昕指出,《张仪列传》“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的记载有误,据《秦本纪》及年表,“伐蜀乃惠王后九年事。此传叙于惠王十年以前,则误以为前九年矣。”^①又指出,《范雎传》中范雎说秦“至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云云,与事实不符。范雎说秦在昭王三十六年,“是时秦用白起破赵、魏及楚者屡矣,而穰侯方出兵攻纲寿,安有闭关十五年之事?”^②其实范雎说秦,用的是战国纵横家的口吻,为打动君王,难免危言耸听,夸饰失实。司马迁如实记录,正可见出范雎的为人特点,清儒却死抠字义,斤斤计较于这十五年中的频繁战事,把本不该坐实的地方去硬性坐实,照此办理,《史记》将大失光彩,范雎作为游说之士的特点也就荡然无存了。这是清人为考证而考证的弊病。

如果说像范雎这类游说之辞中涉及的时间问题可以存而不论,那么,是不是凡司马迁叙述语中谈到的时间就应一一落实呢?看来也不尽然,因为司马迁有时也用夸饰之笔。对这个问题处理的较好的是郭嵩焘。我们先看例子:《魏公子列传》说:“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郭氏在《史记札记》卷五上据《史记·魏世家》指出:“安釐王元年,秦拔魏两城;二年,又拔二城;三年,拔四城;四年,秦破魏,予秦南阳以和;九年,秦拔魏怀;十一年,秦拔魏鄖丘;齐楚攻魏,秦救之,魏王因欲伐韩求故地,信陵君谏;二十年,秦围邯郸,信陵君矫夺晋鄙军救赵。盖自魏安釐王立,无岁不有秦兵。是时秦益强,六国日益弱。而赵将楼昌攻魏几,廉颇攻魏房子,又攻安阳。所谓‘诸侯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是史公极意描写之笔,无事实也。”郭嵩焘比钱大昕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既看到所谓“诸侯不敢加兵”云云,与事实并不相符,又能看到这是司马迁对魏公子的极意描写。此时此刻,司马迁重在刻画人物,而不是在作信史。这样分析,比较接近司马迁作史的实际,对读者也有帮助。

^①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卷五,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② [清]钱大昕撰,陈文和、张连生、曹明升校点:《廿二史考异》卷五,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